

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及贡献研究

苏日古其格

内蒙古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2

摘 要 : 在十月革命结束后, 葛兰西对西方社会主义发展及十月革命失败的经验与教训进行了深入总结,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文化领导权理论。其核心思想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以市民社会作为实践的关键场域, 以“有机知识分子”作为推动变革的主要力量, 并将阵地战作为实现目标的核心策略。

关 键 词 : 葛兰西; 文化领导权; 市民社会

Gramsci's cultural leadership theory and contribution research

Surigu Qiqige

School of Marxism, Inner Mongolia Normal University, Hohhot, Inner Mongolia 010022

Abstract : After the end of the October Revolution, Gramsci made a thorough summary of the experience and lessons of the development of western socialism and the failure of the October Revolution, and put forward the cultural leadership theory on this basis. Its core idea mainly includes three aspects: taking civil society as the key field of practice, taking "organic intellectuals" as the main force to promote the reform, and taking positional warfare as the core strategy to achieve the goal.

Keywords : Gramsci; cultural leadership; civil society

一、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历史背景

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形成, 与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有着密切的联系。这场革命不仅掀起了全球范围内的无产阶级革命热潮, 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动荡。尽管欧洲许多后续革命遭遇失败, 但这些失败的经验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深层的矛盾, 同时也加剧了帝国主义体系的危机, 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提供了宝贵的理论反思契机。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意大利经济陷入严重衰退, 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更加显露, 社会矛盾进一步尖锐化。在这种背景下, 法西斯主义迅速崛起, 建立了专制政权, 并对社会进行全面控制。面对这一挑战, 葛兰西坚定地领导无产阶级开展反法西斯斗争, 强调构建统一战线, 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 推翻独裁, 实现社会解放。在这一实践中, 他认识到, 单纯模仿俄国革命的模式, 无法有效应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复杂的社会结构和市民社会的深厚根基。

葛兰西认为, 俄国革命的胜利得益于其政治性国家的单一性, 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则拥有由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组成的二元结构。市民社会通过自由、民主、法治等理念, 构建起强大的文化秩序和道德体系, 从而对无产阶级革命形成了巨大的制约力量。因此, 葛兰西提出, 无产阶级必须在文化领域展开斗争, 逐步取代资产阶级在文化领导权上的优势, 才能最终实现政治领域的胜利。这一理论不仅总结了革命失败的教训, 也为西方无产阶级探索符合自身社会条件的革命道路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

二、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思想渊源

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构建, 直接受到列宁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的启发。列宁提出了关于无产阶级在政治权力斗争中的领导力构想, 虽然在意识形态领域有所涉及, 但他更加强调通过政治权力的掌控来夺取国家政权。而葛兰西则在此基础上, 将领导力的核心延展至文化与道德领域, 强调文化斗争的重要性。

同时, 拉布里奥拉提出的“实践哲学”是葛兰西理论的重要思想来源。拉布里奥拉将实践哲学视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 认为实践是所有人类活动的总和, 而现实中的个体及其社会关系则构成了该理论的出发点。葛兰西在吸收这一理论的同时, 对其进行了扩展与深化, 使其成为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基石之一。

此外, 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也对葛兰西的理论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葛兰西看来, 《君主论》不仅是一部劝说君主的政治著作, 更是一种向意大利民众传播“集体意志”理念的方式, 其核心在于推动民族国家的建立和社会整合。这种视角为葛兰西从文化和道德层面对无产阶级革命展开更深刻的思考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三、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核心要义

(一) 文化领导权的核心场域——市民社会

在葛兰西的理论体系中市民社会这一概念占据重要地位, 同时也是其文化领导权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在他的国家理论中, 葛兰西特别关注市民社会的角色和功能。他认为, 国家是政治社

会与市民社会相互结合的有机整体，两者共同构成治理的辩证统一关系。市民社会作为一种中介力量，主要基于经济关系的组织和社会团体构成，其关键在于通过文化领导权来获得群众的“认同”和支持，从而实现治理的合法性和稳定性。

学术界普遍认为，“市民社会”这一术语源于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他将其理解为城邦的代名词。到了17至18世纪，市民社会再度引起思想界的关注。洛克、卢梭和康德等思想家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市民社会的特性，并常常将其与政治社会等同，赋予其明显的道德判断。与之不同的是，黑格尔为市民社会的概念注入了全新的内涵。他突破了传统思想家将市民社会等同于政治社会的观点，结束了二者混同的时代。而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早期著作中，“市民社会”具有双重涵义。从广义上看，它泛指不同时期所形成的经济体系；而从狭义角度理解，则专指资产阶级社会中以物质关系为核心的经济结构。

葛兰西以批判性的眼光审视市民社会，其思想既有别于黑格尔，也不同于马克思。在《狱中札记》中，他对市民社会的定义超越了传统的经济领域，将其拓展至伦理文化与意识形态范畴。尽管这些领域与经济基础密切相关，它们却作为独立于政治领域并列的上层建筑而存在。在《狱中札记》的不同语境中，“市民社会”具有至少三种主要含义：一是指“私人”机构和组织的集合；第二点指的是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第三点则强调了“被调和的社会”这一概念。

葛兰西指出，思想意识并不能被简单统治，而无产阶级革命屡屡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缺乏对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重视。在对无产阶级运动失败的反思中，他明确强调，尽管表面上看可能成功攻破资产阶级的军事防线，但实际上，“这仅仅是摧毁了它的外壳，而在攻城者继续推进时，才发现前方仍然存在一条完整有效的防线”^[1]。无产阶级必须首先在意识形态领域瓦解敌人的文化霸权，才能真正占据主导地位。

葛兰西还认为，“国家 = 政治社会 + 市民社会”，这意味着国家是“被加强的领导权”^[2]。他将市民社会纳入上层建筑范畴，指出所有国家概念均包含市民社会的某些组成部分。上层建筑作为民间社会的集合体，不仅包括政治社会（如军队等暴力机构），还涵盖市民社会（如教会、政党等）。政治社会通过强制手段维持统治，而市民社会则依靠潜移默化的文化传播发挥影响力。因此，无产阶级若想实现胜利，必须击破资产阶级在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支配地位，并在适当时机掌握国家的领导权，激发广大群众的无产阶级意识，从而建立共同的集体意志。

（二）文化领导权的策略：阵地战

在葛兰西的理论框架中，有机知识分子通过实施阵地战战略逐步取得文化领导地位。在多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市民社会已经成为国家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结构不仅增强了国家权力的稳定性，还能够政治和经济危机中为国家提供必要的支持。与此相对，俄国的情况则截然不同。通过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可看出，当时的市民社会尚未充分发展，因而国家的作用更加凸显。因此，俄罗斯的社会状况更适合采用暴力革命的方式，即通过运动战来推翻现有政

权。相比之下，西方发达国家由于市民社会的强大，无产阶级只能通过阵地战来逐步控制国家的权力结构。

阵地战作为与运动战相对的战略，强调在政治斗争中的不同方式。具体而言，阵地战指的是无产阶级通过对资产阶级文化及市民社会的思想体系展开批判和斗争，逐步削弱其统治基础。无产阶级利用学校、报纸、杂志等媒介，获得合法性支持，并通过教育、引导及说服等方式，逐步影响和改变群众的思想观念。与此相对，运动战则依赖暴力手段，如手榴弹、枪支等武器，通过直接摧毁国家机器，重建社会秩序。然而，单纯依靠运动战手段，资产阶级的统治基础始终处于不稳定的边缘状态，其权力并不会牢固确立。单纯依赖运动战的方式，往往只能摧毁资产阶级的外围防线，无法深入根本性地改变其控制体系。与此不同，阵地战通过在市民社会内部进行深层次的思想斗争，能够发动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精神革命”，从而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上逐步瓦解资产阶级的主导地位。

葛兰西指出，十月革命成功的根本原因在于俄国市民社会的不发达，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失败则源于高度发达的市民社会。作为统治阶级的重要防御机制，市民社会通过传播文化观念与意识形态，有效缓和了阶级矛盾并巩固了统治的合法性。在这种情形下，单靠暴力革命已不足以摧毁资本主义国家机器，无产阶级必须以阵地战的方式逐步推进。“‘文化领导权’的实现，并非单纯依靠压制和强制，而是在斗争、谈判、调解等互动过程中完成的”^[3]。

阵地战的关键在于有机知识分子在市民社会中渗透无产阶级的文化观念与意识形态。他们通过教育、引导和说服的方式，逐步争取被统治阶级的认同与支持。根据市民社会的具体发展状况，无产阶级需要采取细致而渐进的策略，为革命创造有利条件，从而根本改变现存的权力结构。

（三）文化领导权的力量——“有机知识分子”

要实现文化领导权的全面掌控，必须依赖一种能够广泛传播、有效说服并发展思想的力量，而这种力量的核心便是有机知识分子。无产阶级在阵地战中争取人民群众的支持，关键在于积极动员和组织有机知识分子发挥作用。

传统知识分子是指那些源自历史的特定社会结构和生产方式的群体，即便这些生产方式已经被摧毁，他们仍以代际传承的方式延续下来。传统知识分子通常包括教士、哲学家、艺术家、作家、以及新闻从业者等群体。传统知识分子在社会和政治剧变的背景下，往往能够保持相对的稳定性。尽管其原本的社会基础已经逐渐解体，他们仍认为自己具有历史的连贯性和独立性，视自己为“超然于统治阶级的社会集团”^[4]。

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概念则可追溯至19世纪的俄国与法国。在19世纪末期，俄国的知识分子大多来自中产阶级，受到西方文化和近代教育的影响。他们对俄国的落后和专制感到强烈不满，并逐渐在法律、医疗、教育等领域中确立了重要地位^[5]。同时，1894年法国德雷福斯事件激发了知识分子的觉醒与集体行动，左拉等人通过《知识分子宣言》为社会正义发声，使“知识分子”这一群体获得了正面评价。葛兰西继承了这些思想资源，

并进一步发展出独特的知识分子理论，为社会变革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和动力^[6]。

葛兰西指出：“要是没有知识分子，那就是没有组织者和领导者，也就是没有组织的”^[7]。他从社会关系的角度重新定义了知识分子的内涵，主张知识分子不应依据活动性质划分，而应结合其与社会的关系来看待。在葛兰西的视野中，虽然所有人都具有知识活动的潜能，但并非每个人都具备知识分子的功能和职责^[8]。

第一，知识分子的组织功能：知识分子被视为统治阶级与市民社会之间的纽带，承担着通过传播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来组织和引导群众的职责。他们使大众自觉认同统治阶级的合法性。基于此，无产阶级需要培养一批具有自身特点的有机知识分子，通过他们的组织能力和影响力，逐步争取广大群众对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认同，从而最终实现对文化领导权的掌控^[9]。

第二，知识分子的教育功能：葛兰西认为，夺取文化领导权不仅依赖于组织能力，还要求知识分子肩负起教育人民的责任，促进群众的知识分子化。只有当知识分子能够与群众在理论和实

践上相结合，文化与社会变革力量才能有效发挥作用。脱离实践的知识分子容易陷入空想，而缺乏理论指导的群众则容易被统治阶级操控。因此，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是无产阶级夺取文化领导权的根本所在^[10]。

四、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贡献

葛兰西的文化指导理论对无产阶级领导权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其哲学和政治思想的探讨，他击败了传统学者对这一理论的教义解释，这引起了人们对文化领导权问题的关注，从而也改变了以前的刻板论述。葛兰西的理论不仅吸收了列宁、拉比和马基雅维利等思想家的观点，而且还结合了对西方社会的深刻观察。市民社会、实践哲学和有机知识分子理论为这一研究领域创造了独特的视角，为领导者创造了创造性的思想和独特的视角^[11]。

参考文献

-
- [1] 俞吾金, 陈学明. 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 [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0: 109.
- [2] 葛兰西. 狱中札记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3: 238.
- [3] 孙晶. 文化霸权理论研究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27.
- [4] 葛兰西. 狱中札记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3: 421.
- [5] 葛兰西. 实践哲学 [M].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93: 15.
- [6] 葛兰西. 实践哲学 [M].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93: 107.
- [7] 秦子业. 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及其现实意蕴研究 [D]. 通辽: 内蒙古民族大学, 2023: 24.
- [8] 王奕博, 赵鑫. “历史”对话“现实”: 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的当代解读与应用 [J]. 理论研究, 2022 (06): 73-80.
- [9] 宋陈. 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对我国文化建设的当代启示 [J]. 中国军转民, 2022 (14): 68-69.
- [10] 张繁星, 宁莉莉. 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研究 [J]. 今古文创, 2022 (21): 56-58.
- [11] 罗玉竹. 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及其哲学基础 [J]. 安顺学院学报, 2022 (01): 99-101.